

曾國藩的歷史地位

張玉法

一、前言

一個歷史人物的歷史地位並不是固定的。有的由於新史料的發現，改變後人對他的看法。譬如唐太宗是一代名君，他以次子繼承帝位，新舊唐書都說他英明能幹，唐高祖乃傳位給他。後經歷史學家考證，是唐太宗在玄武門之變時殺了哥哥建成，高祖不得已才傳位給他。這雖然無損於歷史學家對貞觀治績的肯定，在人格上總是有虧。另外，由於後人的政治觀點與前人不同，對前人也產生不同的評價。譬如王莽篡漢，一向被視為奸臣，但胡適卻大為讚揚他的改革措施，目的在鼓勵後人勇於改革，不要保守。又譬如宋朝岳飛攻打金兵，勇敢善戰，一向被捧為「精忠報國」的偶像，但民國初年呂思勉寫「中國通史」，感於當時軍閥亂國，不聽號令，乃逕指岳飛為軍閥，因為宰相秦檜主張與金兵談和，岳飛不聽命令，下了十九道金牌，才將岳飛調回。

對曾國藩的歷史評價，也有類似的情形。曾國藩逝於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一年），到現在共一百二十年。在此一百二十年中，對曾國藩的歷史評價大體是肯定的；但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對曾國藩則持否定的態度，說他幫助滿人壓制漢人、說他代表封建地主壓迫農民。曾國藩逝世後，首先臚陳曾國藩的功業而加以肯定者為江蘇巡撫何璟，他在奏疏中認為曾國藩「輔佐聖世中興之業」，是在極為艱困的情形之下：「一錢一粟，非苦心經營，則不能得；一弁一勇，非苦心訓練，則不能戰」。而且曾家兄弟及其所帶的湘軍，皆忠勇為國：「湘軍陣亡文武官兵，可以按冊而稽者，多至萬餘人。咸豐八年三河（安徽）之戰，其胞弟曾國華隨李續賓以單騎衝賊死。同治元年，雨花臺之戰，其胞弟曾貞幹（國葆）於退數日，帶疾而死，可謂一門忠義矣！」【註一】曾之幕府容閔則讚曾為「完全之真君子，而為清代第一流人物」。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以後，孫中山倡導民族革命，革命黨人如章炳麟對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的反滿運動頗有微詞，但提倡改革的梁啟超則對曾國藩大

爲讚揚，他說：「曾文正公，近日排滿家所最唾罵者也。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爲使曾文正公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彼其能率厲羣賢以共圖事業之成，有所以孚於人且善導人者在也。」【註二】民國建立之初，受民族革命史觀的影響，對太平天國的革命給予較高的評價，對曾國藩的評價相對減低。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將「清史稿」查禁，部分原因即爲「清史稿」表揚曾國藩的中興之功，而稱太平軍爲「匪」。到一九三〇年李一塵著「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一九三二年張宵鳴著「太平天國革命史」，復本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指曾爲保護地主、商人及清朝政府，爲反民族革命的大官僚。國民政府適正在江西從事剿共，對曾國藩剿太平軍的處境深爲同情，乃開始肯定曾國藩的道德、學術與事功。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正在廬山訓練團的講演中，公開讚揚曾國藩的堅忍沉毅精神，且出版「增補曾胡治兵語錄」。約在同時，蔣星德於一九三五年出版「曾國藩的生平及事業」、何貽焜於一九三七年出版「曾國藩評傳」，均對曾國藩的立德、立功、立言，大爲讚揚。【註三】

對曾國藩持否定態度，除前述李一塵、張宵鳴的著作外，較爲著名者是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范文瀾於一九四四年在延安所寫的「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書中指曾國藩爲對外投降、對內屠殺的劊子手，並指明他是「安內攘外」路線的第一個大師，但對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尙能包容。其後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對曾國藩的評價大體與范文瀾的觀點相似。一九五七年以後，中國大陸由於極左思想抬頭，大陸學者不敢輕易研究曾國藩。到一九七四年前後，由於要批判林彪，從批評孔子、批評曾國藩來影射，曾國藩才被批評的體無完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受政治上「實事求是」的影響，大陸學者對曾國藩的評價也開始「實事求是」。從卡哲著「曾國藩」、朱東安著「曾國藩傳」等書，以及許多有關曾國藩的論文看來，大概是採取不完全否定、也不完全肯定的態度。至少對曾國藩組湘軍打太平天國以前從事科考、究心學問、上書咸豐皇帝痛陳民間疾苦等事，是相當肯定的。【註四】至於近年臺灣地區及美、日等國的學者，對曾國藩的評價，略如清末至抗戰前，大體仍持肯定的態度。

曾國藩的一生，約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一八一一年（嘉慶十六年）至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除幼稚時期外，大體爲求學與應考時期；曾於一八三八年中進士。第二階段，自一八三八年至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大體居京爲京

官，先後任翰林院庶吉士、禮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兼署吏部左侍郎等職。第三階段自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以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爲分界，前一段多在湘軍營中調度軍務，後一段任兩江、直隸總督，參預國家大政。【註五】曾國藩除在討平太平天國戰爭中，使清朝中興、人民減少災難、文化免於淪亡以外，在敦品治學上、在開創洋務運動上，也均有特殊的歷史地位。

二、敦品：從修身到齊家

曾國藩是一個儒者，非常重視修身、齊家。他修身的標準，見於他在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所撰的「五箴并序」。

五箴第一爲立志，以先哲爲典範，荷道以躬；第二爲居敬，做到對人不怠慢、治事要勤快；第三爲主靜，能够專心一志、處變不驚；第四爲有恆，在進德修業時，不爲物牽，不喜新厭舊；第五爲養身，要不藏怒、不宿怨、泰而不驕、威而不猛、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容止有定，心安理順。【註六】

上述五箴爲修身到一般原則，立於一八四四年，是年曾國藩充翰林院庶吉士，又轉補翰林院侍講學士。就寫於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至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的部分家書及寫於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到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的部分日記分析，【註七】曾國藩的修身，可以分爲養身、養心、養性三部分。關於養身，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的日記有云：

接家信，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節慾、節勞、節飲食。

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致四弟函有云：

養身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恆，二曰懲忿，三曰節慾，四曰每夜臨睡洗脚，五曰每日兩飯後，各行三千步。

其他養身之法尚多，如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致四弟、九弟函中謂：「家中後輩子弟，體弱學射，最足保養，起早尤千金妙方、長壽金丹」。又如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致九弟、季弟函，謂無病可偶服補藥，有病則以不藥爲宜。

關於養心，從曾的日記看，多不成功，亦可見曾對自己督責很嚴：①一八四三年記：「克去一念，旋生一念，飯後靜坐，即已成寐」；又記：「余今悶損至此，蓋身被私慾纏擾矣！尚何以自拔哉！」②一八五三年記：「今年忽忽已過兩月，自新之志，日以不振。」③一八六〇年記：「寸衷微有鬱結，總由中無所得。」④一八六二年記：「近來事有不如意者，方寸鬱塞殊甚，亦足見氣量之不闊、養氣之不深也。」

關於養性，據前述家書中所言，約有數方面：①一八四四年家書：戒驕傲，不自滿。②一八六一年家書：不發牢騷，不怨天尤人。③一八六四年家書：萬事看空，毋惱毋怒。④一八六七年家書：不偏急，息心忍耐。

養身、養心、養性皆為修身。修身，在曾國藩看來，像齊家、治國一樣，可從格物、誠意做起。格物即致知，誠意即力行。他說：「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齊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一八四二年家書）其他修身的方法，最重要的是痛改從前過失，曾國藩在日記中，經常自我檢討，冀圖改過。一八六四年記云：「近日省察自己短處，每日怠玩時多，治事時少；看書作字、治私事時多，察人看稿、治公事時少。職分所在，雖日讀古書，其曠官廢弛，與廢於酒色遊戲者一也。」一八六九年記云：「余日衰老，而學無一成，應作之文甚多，總未能發奮為之。忝竊虛名，毫無實際，愧悔之至。」一八七〇年記云：「到江寧任又已兩月餘，應辦之事，全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飽食酣眠，慚愧至矣！」

曾國藩的修身，是一生的過程。在刻苦自勵的過程中，曾國藩於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二十七歲時中進士、點翰林，其後迄於一八五二年離京返湘前，先後任過四川鄉試正考官、禮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等職，使其默默無聞的家庭，聲望陡升，特別在練湘軍、平定太平天國、任兩江總督之後。曾國藩既注重齊家，在曾家成為仕宦家族（國藩弟國荃，因從征太平軍有功，一八六三年被任命為浙江巡撫）之後，曾國藩對齊家特別注意。

曾國藩中舉人（一八三四），進士（一八三八），使曾家由下層士紳的地位（一八三三年曾國藩與父曾毓濟同中秀才）進入上層士紳。其後曾國藩、曾國荃兄弟戡平太平天國，造中興之業，二人同獲封爵（國藩封一等侯，國荃封一等伯），更使曾家成為仕宦之家。【註八】一個家族興起，正如一個國家建立，主其事者必須兢兢業業，以保持家國於不墜。從各種文獻

看來，曾國藩對曾家的經營，確是非常用心的。

曾國藩是湖南湘鄉人，世以耕讀傳家，父親出身秀才。曾國藩兄弟五人，已居長，次為國潢、國華、國荃、國葆。國潢在鄉主持家務，其餘三個弟弟隨他讀書、作戰在外，其間國華戰死，國葆在戰場病死，獨國荃立有戰功，官拜巡撫。國藩的子女，有曾紀澤、曾紀鴻、曾紀芬等。曾國藩對自己的家族，有三方面的期望：一是家中出現名學者，為世所仰望；二是家風廉謹敬慎，彬彬有禮；三是以稼穡為本，不廢農圃。【註九】曾國藩治家的八字訣是：早、掃、考、寶、書、蔬、魚、豬。早者起早，掃者掃屋，考者祭祖，寶者對親族鄉里賀喜弔喪、問病濟急，書者讀書，蔬者種菜，魚者養魚，豬者養豬。除八字訣外，另亦要求不信地師、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一八六〇年致四弟、一八六一年致四弟）。【註一〇】曾國藩教子弟又有八本、二詩、四課之說，八本是「讀書以訓詁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身以戒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作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一八六一年致四弟）。【註一一】二詩指不忤、不求，所謂不忤是消除嫉妒，禮讓外人，與人為善；所謂不求是能知足、戒貪得。四課指慎獨（為善去惡）、主敬（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求仁（仁民愛物）、習勞（不好逸惡勢）（一八六七年諭紀澤、紀鴻）。【註一二】又為諸弟立課程表，列舉十二項：(1)主敬，(2)靜坐，(3)早起，(4)讀書不二（一書未完，不看他書），(5)讀史，(6)寫日記，(7)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8)謹言，(9)養氣，(10)保身，(11)作字，(12)夜不出門（一八四二年致諸弟）。【註一三】更以八德教諸子：勤、儉、剛、明、忠、恕、謙、渾，並以「渾」、「勤」二德分別教二子，謂「澤兒天質聰穎，但嫌過於玲瓏剔透，直從「渾」字上用工夫；鴻兒則從「勤」字上用工夫」（一八六六年諭紀澤、紀鴻）。【註一四】

除前述較為有系統的齊家原則外，曾國藩在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六七年的家書中，經常使家人引以為戒的，主要有以下兩項：①驕、傲（一八四四、一八五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②懶、惰、佚（一八五四、一八五五、一八六〇、一八六一、一八六二）。經常對家人要求的，約有以下九項：①謙恭、謙敬、謙謹（一八四九、一八六一、一八六四）；②勤、勤敬、勤苦（一八五四、一八五六、一八六〇、一八六二、一八六四）；③儉（一八五六、一八六〇、一八六一、一八六三、一八

六四、一八六五、一八六六；④勞苦（一八五六、一八六一、一八六七）；⑤孝悌、孝友（一八四三、一八四九）；⑥逆來順受（一八六七）；⑦持盈保泰（一八六三）；⑧重農事（一八五八、一八六六）；⑨救濟親戚、族人（一八四一、一八四四）。【註一五】

曾國藩的家風，可以曾死後何璟的奏中略見一、二：「安慶克復，則推功於胡林翼之籌謀、多隆阿之苦戰；金陵克復，又推功諸將，無一語及其弟國荃。談及僧親王及李鴻章、左宗棠諸人，皆自謂十不及一。清儉如寒素，廉俸盡充官中用，未嘗置屋一廛、田一區；食不過四簋，男女婚嫁，不過二百金，垂為家訓。」【註一六】

曾國藩由於剿太平天國有功，一八六〇年七月授兩江總督，一八六一年十一月更受命節度江、皖、贛、浙四省軍務。曾國藩在給李鴻章的信中，自認「兵權過重，利權過大」，【註一七】因此個人小心翼翼。到一八六四年曾國荃克南京後，由於軍紀不良，大肆搶掠，頗為輿情所不容，曾國藩乃將曾國荃所部的湘軍五萬餘人裁撤萬餘人，另並陳請曾國荃因病開缺，回藉調養。一八六五年八月，清廷授國荃為山西巡撫，曾國荃托病辭謝。直到一八六六年三月調其任湖北巡撫，始赴任。

【註一八】曾國藩深悟「持盈保泰」的道理，故為曾家建立了謙遜自處的家風。

三、治學：游刃於義理與經世之間

曾國藩一生治學，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大概說來，在北京任官時期，是以理學為宗；到辦團練、剿太平軍時期，則兼之以經世。他在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八月的日記中說：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予於四者略涉津涯，……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思錄；詞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曾氏讀古文鈔，曰曾氏讀詩鈔，二書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亦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

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易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此十種者，要須爛熟於心中。【註一九】

曾國藩廣泛涉獵四學，其中義理和經濟二學，與儒家的修齊治平之學直接相關。「經濟」意為經世濟民，故又名「經世」，以與今之「經濟」相別。

從一八三八（道光十八年）到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曾國藩在十幾年的京官生活中，結交了好幾位影響其終身思想與治學的師友，其中最重要的是太常寺卿唐鑑，和大學士倭仁。唐鑑服膺程朱之學，是當時義理學派的重要學者之一；曾國藩經常向他請教。在一八四一年八月三十日（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的一次談話中，唐鑑教國藩敦品治學，當以「朱子全書」為依據。唐鑑認為學問之道有三途：義理、考據、詞章，其中義理最重要，而義理工夫最切要之處，乃在於「不自欺」。為此，唐鑑特別推崇倭仁；倭仁對自己每天的飲食言行都有箴記；凡自己思想行為有不合於義理的，全都記載下來，以期自我糾正。曾國藩又向唐鑑問「經濟之學」，唐鑑說：「經濟之學，即在義理之內，不必他求。至於用功著力，應該從讀史下手，因為歷代治述、典章，昭然具在，取法前賢以治當世，已經足夠。」經唐鑑的推介，曾國藩對倭仁非常崇拜，並向他學習。為了學習倭仁「誠意」和「慎獨」的功夫，他從一八四二年十一月三日（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一日）起，便立志自新，和倭仁一樣，他將自己的意念和行事，逐日以楷書寫在日記上，以便隨時檢點克治，並將自己所寫的日記，定期送給倭仁審閱，並請他在上面作眉批。雖然到次年八月，因出任四川鄉試正考官，日後無暇再請倭仁批閱日記，但曾在日記中時時嚴刻地自訟自責的精神，却一直維持，終身不變。【註二〇】

清王朝欽定程朱理學為正統思想，曾國藩的義理之學，亦宗程朱，排陸王。宋朝的程顥、程頤和朱熹認為，「理」是世界的本源，它超越於物之上而永遠存在，並支配著物。他們認為，天之生物，有貴賤等級之分，此為「天理」，不可逆轉，逆轉即為人慾。主張「存天理，滅人慾」，富有保守主義的傾向。宋人陸九淵和明人王陽明，認為「心」是世界的本源，一切事物都是主觀的「心」所衍生；認為「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理」，各種秩序皆由主觀的「心」所建立，不是「理」所當然，可以改變，富有改革主義的傾向。【註二一】曾國藩宗程朱，走上衛道、保清的經世之途；而陸王認為「知即行」，只求

心明，無需實行，似乎流於空疏，但其自由思維，卻可能動搖綱常名教和社會秩序。

在一八四二—一八四三（道光二十二至二十三年）年間，曾國藩在家書中，對義理、經世二義有所發揮。一八四二年十月二十一日（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諸弟函中有云：

予嘗謂天下萬事萬理，皆出於乾坤二卦。卽以作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盪，脈絡周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構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氣言，凡坤以形質言。……樂本於乾，禮本於坤。【註三】

一八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諸弟函中有云：

格物，致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卽所謂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卽格物而窮其理也。……所謂誠意者，卽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自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註三】

一八四三年二月五日（道光二十三年一月七日）致諸弟書有云：

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爲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據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分。【註四】

上引三信中所舉、乾、經、樂、神氣、致知，皆爲義理的範圍；坤、史、禮、形質、力行，皆爲經世的範圍。曾國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其後號滌生，又改名國藩，皆有心路歷程。曾國藩於一八三一年改號「滌生」，一八四三年二月五日致諸弟書謂：「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以爲更生之人。」【註五】以「滌生」爲號，屬義理的範圍。一八三八年中進士後，又改名國藩；「國藩」卽爲經世的範圍。

曾國藩游刃於義理與經世之間，在義理方面，從「復性說」出發，認爲「大學」所列條目，重點是「格物」和「誠意」。誠意是力行，格物是致知。致知的方法是「卽物窮理」，他說：「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研乎至殊之分，無以

洞乎至一之理。」在「洞乎至一之理」以後，即加以實行，所謂「知一句便行一句」，這便是經世。【註六】所以在曾國藩看來，義理和經世是貫通的。曾國藩將義理與經世貫通，實欲調和宋學、漢學之爭，而採二家之長。在曾國藩的時代，程朱理學和乾嘉漢學已經論爭了一百年。漢學大師指責程朱理學空疏，理學大師指責漢學的訓詁、考據是破碎害道。漢學原欲從「經世致用」做起，清初大儒王船山、顧亭林等感於宋學坐而論道、空談心性，不能實事求是，從而提倡經世致用之學。但以康熙、雍正年間，屢興文字獄，禁錮思想，迫使有心經世的儒士不敢觸及時政，只能在考據訓詁等方面下工夫，形成了乾隆、嘉慶年間以考據、訓詁為主要內容的漢學。道光、咸豐年間，清朝國勢衰落，曾國藩既曾在京師從唐鑑、倭仁等習理學，修養心性，卽物窮理，復關切國家、社會事務，當時文網稍紓，曾國藩於一八五〇—一八五一年間，連續寫了「應詔陳言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議」、「議汰兵疏」等奏摺，以激切的語言，揭露政治和社會的弊病，並提出綜核名實、整飭吏治等改革方案，【註七】開始走上了經世致用之路。

曾國藩是一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儒者，他的一生，是依照「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路奮鬥不息。理學是他「修己」的工夫，經世是他「治人」的工夫。曾國藩的經世綱領，重要的有五項：①崇尚禮治：曾國藩以禮為經世之具，他說：「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又說：「自其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其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其崇尚禮治之目的，在扶持名教，維持社會秩序。故在「討粵匪檄」中說「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其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註八】②兼用法治：曾國藩奉命辦團練，目睹當時因循苟且之風氣，用法頗尚嚴厲，不拘泥於儒家德治之說，深知「欲免敗羣，須去害馬」。【註九】曾國藩在長沙設審案局，拿到匪徒，立加嚴訊，按情治罪。因殺人甚多，時人有「曾羅頭」之號。【註三〇】③講求吏治：曾國藩認為洪楊之亂及捻亂相繼發生，係由於吏治敗壞。談到洪楊之亂，謂係「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復反顧」；論及捻亂，謂係「不講吏治，從亂之民日多」。【註三一】曾國藩整飾吏治的方法是，先從本身做出一個榜樣，然後再選吏、察吏、訓吏、卹吏。【註三二】④端正風俗：曾國藩非常注重端正風俗，並希望在上者以身作則，他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註三三】曾國藩修身、齊家、治學的風範，實足為天下倡。⑤辦理軍務：曾國藩

由儒生變儒將，對帶兵之法、戰陣之術，非常講究。曾國藩識拔賢將，以仁禮帶兵；並要求帶兵之人不怕苦、不怕死、不急名利、勤於勞動、待人公明，要求帶兵之人於戰陣之時彼此相顧相救，不妒功嫉能。【註三四】

儘管在經世方面，曾國藩表現卓越，他仍然認為「人」為「事」的本源，他說：「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他甚至認為，創辦湘軍，鎮壓太平軍成功，都是因為羅澤南、李續賓諸將領「以忠誠為天下倡」。【註三五】因此，曾國藩的經世，是以義理為出發點。

四、定亂：從忠君到保教愛民

曾國藩組織湘軍，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史家對其有不同的評價，蕭一山著「清代通史」，指太平天國為民族革命的先驅。【註三六】曾國藩之滅太平軍，有違民族大義。但蕭對曾國藩剿太平軍之動機尚有分析，認為目的不是在保一姓一朝之清王室，而另有更大目的：①保天下：指維護仁義道德及民族文化。②保中國：怕滿清滅亡，會引起中國長期內亂。③保人民：謂平亂係以救民為急務。【註三七】到一九四四年范文瀾寫「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便直接攻擊「曾國藩及其領導的一羣人，絲毫沒有民族思想」。【註三八】實在，曾國藩之組湘軍、平太平天國，可以從三方面理解：

其一，忠君：無論曾國藩是否有意維護一姓一朝，其忠君立場是不可置疑的。忠君為傳統中國最大的道德，不能以「漢奸」視曾國藩。且「漢奸」一詞，應用在漢人的王室末亡以前而效忠或私通外敵者。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的時代，清王朝已建立二百年，若謂曾國藩為漢奸，則全國漢人，凡當兵、納賦、服官者，無不可視為漢奸。清朝為中國歷史的正統王朝之一，明朝滅亡後效忠清朝，不能以漢奸視之。

曾國藩的忠君，至易理解：第一，他出身儒家，尤究心於宋代理學，對三綱五常之教，篤信不疑。他在「家訓」中說：「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註三九】他在「湘鄉昭忠祠記」中說：「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註四〇】第二，他科考、服官一帆風順，皇帝對他信任有加，時有感恩圖報之想。曾國藩二十三歲中秀才（一八三三）、二十四歲中舉人（一八三四）、二十八歲成進

士（一八三八），此後十年擔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講學士、會試同考官、殿試讀卷大臣、四川鄉試正考官、武會試正總裁等職務，三十七歲升授內閣學士（一八四七）、三十九歲升授禮部右侍郎（一八四九）兼署兵部右侍郎、四十一歲兼刑部左侍郎（一八五一）、四十二歲兼署吏部左侍郎（一八五二）、四十三歲丁母憂在籍時奉命幫辦本省團練。其後即組湘軍，剿太平軍。五十歲時加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一八六〇），次年賞太子少保，節制蘇、皖、贛、浙四省軍務。【註四一】曾國藩在家書中，不斷表達其感恩圖報之心。一八四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致諸弟函云：「予得超升內閣學士，顧影捫心，實深慚悚！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註四二】一八五一年六月十三日（咸豐元年五月十四日）致諸弟函云：「余又進一諫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其言頗過激切，而聖量如海，尚能容納，豈漢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余之意，蓋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為不尊，堂上則誥封三代，兒子則蔭任六品，不為不榮，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建言？」【註四三】一八五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咸豐五年六月十六日）致諸弟函云：「余食祿已久，不能不以國家之憂為憂，諸弟則儘可理亂不聞也。」【註四四】一八六〇年八月致九弟函云：「吾惟以勤字報吾君，以愛民二字報吾親。」【註四五】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致四弟九弟函云：「吾家一門受國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註四六】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四弟九弟函云：「京師十月以來，新政大有更張，皇太后垂簾聽政，中外悚肅。余連接廷寄諭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權位太尊，虛望太隆，可悚可畏。」【註四七】第三，父親時以盡忠督訓曾國藩兄弟，使彼等不得不移孝作忠。一八五一年六月十三日（咸豐元年五月十四日）曾國藩致諸弟函云：「父親每次家書，皆教我盡忠圖報，不必繫念家中。余敬體吾父之教訓，是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註四八】皇帝對曾家的忠義，亦甚為知悉。一八五七年上諭云：「伊父曾麟書，因聞水師偶挫，又令伊子曾國華帶勇遠來援應，尤屬一門忠義。」【註四九】一八六一年上諭云：「曾國藩曉暢戎機，公忠體國，中外咸知。」【註五〇】第四，曾國藩係極守本分之人，既受朝命，只得盡心盡分。盡心盡分即是忠，他的「筆記」十二則「忠勤」一則中說：「忠不必有過人之才智，盡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過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註五一】關於此點，他在家書中亦有所表白。一八五四年五月十日（咸豐四年四月十四日）致諸弟函云：「兄不善用兵，屢失事機，實無以對聖主，……吾惟盡

一分心，作一日事，至於成敗，則不能復計較矣！」一八五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咸豐五年六月十六日）致諸弟函云：「大亂之弭，豈盡由人力，亦蒼蒼者有以主之耳。……然辦一日事，盡一日心，不敢片刻稍懈也。」【註五二】曾國藩的忠心，不只表露給家人，亦表露給朋友，如一八五四年一月致李元度函云：「當此艱難呼吸之際，下走食祿有年，心肝奉於至尊，膏血潤於野草，尙復何辭！」【註五三】

曾國藩不僅個人忠君忠國，其部將亦忠君忠國，且均以忠義爲天下倡。一八五六年湖北巡撫胡林翼在武昌成立節義採訪局，採訪湖北省死亡的忠義之士，並先後上書十七次請求清廷褒揚。迄於一八六一年胡林翼逝世爲止，採訪而得者超過一萬五千人。一八六〇年五月，曾國藩受命署理兩江總督後，在祁門成立忠義採訪局，隨著軍事進展，此局於一八六一年移安慶，一八六四年移南京。忠義採訪局採訪到的總人數不詳，據曾國藩在奏摺中報告，僅一八六〇年九月至十一月，即有官紳十七人、平民一百八十三人、婦女五十九人。【註五四】曾國藩文集中，有「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金陵軍營官軍昭忠祠記」、「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湘鄉昭忠祠記」等文，均表示湘軍在各處表彰忠烈的情形，其中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列神主一萬一千六百三十餘。【註五五】

其二，保教：所謂保教，即前述蕭一山所謂保天下，即保仁義道德、保民族文化之謂。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有云：自唐虞三代以來，歷史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呼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註五六】

太平天國在「奉天討胡檄」中強調「天下者中國之天下，非滿洲之天下也；寶位者中國之寶位，非滿洲之寶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國之子女玉帛，非滿洲之子女玉帛也」。【註五七】曾國藩不能從民族大義上與太平天國抗，只有以文化的民族主義來對抗種族的民族主義。一八六一年七月在致九弟函中云：「然使堯舜周孔生於今世，亦不能謂此賊不能痛剿。」【註五八】

經過討太平國之役，湖南人任督撫提鎮等重要職務的名臣有江忠源、胡林翼、曾國荃、羅澤南、李續賓、劉長佑、彭玉麟、劉蓉、郭嵩燾等二十餘人。這些人都是曾國藩網羅而來，有的起自書生，有的起自行伍，有的起自農家；他們都以忠義相切磨，以至誠相結託，各盡所長。【註五九】譬如羅澤南，原來是研究朱子的理學家，湘軍建軍之初，把他的弟子都找來相助。從軍四年後，於一八五六年在武昌戰死。國藩的成功，得力於羅澤南者不少；湘軍名將王鑫、李續賓、蔣益澧、楊昌濬等，皆羅澤南的弟子。這些學生，隨羅澤南征討，白天打仗，晚上講學，【註六〇】以維護名教相砥礪。

取「討粵匪檄」與「奉天討胡檄」相比較，「奉天討胡檄」指胡虜蹂躪中國，風俗、人倫、制度等受破壞，並攻擊清朝的虐政，指滿洲為妖孽。「討粵匪檄」指斥太平天國者有三方面：其一，迷惑人民、虐殺人民。其二，破壞中國良風美俗。其三，暴虐無道。【註六一】「討粵匪檄」強調保衛鄉土、維護儒學名教，不提保衛清朝政權；也許因為「奉天討胡檄」只攻擊清朝，並未直接言明要打倒清朝之故。【註六二】

其三，愛民：曾國藩起自民間，在早期所寫的詩歌中即反映民生疾苦。一八五二年他在「備陳民間疾苦疏」中舉出民間疾苦有三大類：一為銀價太貴，錢糧難納；二為盜賊太眾，良民難安；三為冤獄太多，民氣難伸。【註六三】一八五二年丁母憂，在籍守制，清廷令他幫同湖南巡撫張亮基辦理本省團練事務，他原不打算應命，因好友郭嵩燾勸他以保衛鄉梓為重，他才毅然出山。【註六四】

曾國藩統兵在外之後，「立志以愛民為主」。【註六五】一八五八年致九弟函云：「兵勇擾民，嚴行禁之，則吾夙昔愛民之誠心，弟可為我宣達一、一。」【註六六】一八五八年他在「禁擾民之規」中說：「用兵之道，以保民為第一要義。」【註六七】為此他作了一首「愛民歌」，歌中有云：「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要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註六八】又在「勸誠營官」四條中有「禁騷擾以安民」一條，文云：「所惡乎賊匪者，以其淫擄焚殺、擾民害民也；所貴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官兵擾害百姓，則與匪賊無殊矣！故帶兵之道，以禁止騷擾為第一義。百姓最怕者，惟強擄民夫、強佔民房二事，……為營官者，先禁此二事，更於淫搶壓買等事，一一禁止，則造福無窮矣！」【註六九】一八五九年三月曾國藩在日記中說：「近年從事戎行，每駐札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家、無不嘆

之貧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目擊心傷，喟然私嘆，行軍之害，一致此乎？故每於將官委員告誡，總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義。」【註七〇】湘軍軍紀不良，曾國藩極力整頓，然效果不佳。

曾國藩的愛民之方，除要求軍紀外，在制度上值得稱述者有四項：①營中有伏役編制，可禁止拉伕：每營五百人，另設長夫一百八十人，專供伏役之用。②提高營官待遇，可避免需索：湘軍的營官待遇達二百兩（爲綠營兵營官的二倍），已經足用，【註七一】可避免需索。③使用僱傭兵，可減少拉伕：太平軍利用會黨，湘軍亦利用會黨與之相戰；利用會黨，爲一種僱傭兵，可減少拉伕。④向商籌餉，不在鄉村勸捐：曾國藩在湖南練勇時，在商賈輻輳之區向鉅室殷戶勸捐，不在鄉村勸捐。出省作戰之後，更販浙鹽獲利，【註七二】並創釐金之制。湘軍最大的餉源是釐金，湘軍從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五年共報銷軍費二千九百萬兩，大部來自釐金。【註七三】

五、洋務：開中體西用的宏規

清季洋務運動，於一八五〇年代中期由曾國藩創始，到一八九〇年代中期，因中日戰爭失敗而結束，先後四十年。在洋務運動結束之後，兩湖總督張之洞著「勸學篇」，總結洋務運動的內涵爲「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此一運動方向，實倡自曾國藩。曾國藩的體用之學，源於他的義理和經世之學，義理爲體，經世爲用；體不能變，用可以變。因此，曾國藩能够爲洋務運動建立宏規，使此後李鴻章、左宗棠等人能在洋務上有所建樹。

如前所述，曾國藩一生治學，游刃於義理與經世之間。自一八五二年以後，由於剿太平軍、剿捻，並任兩江、直隸總督辦理政治、財政、外交諸事，經世之學實在對他極爲切要。一八六一年曾國藩在致九弟函中謂：「國藩於本朝大儒，學問則宗顧亭林、王懷祖兩先生，經濟則宗陳恭公。」【註七四】顧亭林即顧炎武，江蘇崑山人，明季爲經世學家，清初曾從事懇牧之業，爲學斂華就實，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無不窮源究委。王懷祖即王念孫，江蘇高郵州人，乾隆四十年進士，精研水利，曾辦河工，川楚事起，陳定亂之策。陳恭公即陳宏謀，廣西臨桂人，雍正時進士，乾隆年間，歷經江西、陝西、江蘇等省巡撫，所在多究人心風俗得失及民間利病，加以興革。【註七五】三人爲其經世之學的本源。曾國藩

對經世之學的態度，可於「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一文中見之。文云：

禮俗致教，邦有常典，前賢猶因時適變，不相沿襲，況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泥之法、不敝之制？……忠臣謀國，百折不同，勇士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其他器械財用、選卒校技，凡可得而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制宜，因應無方，彌縫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顧已守常，姝姝焉自悅其故跡，終古而不化哉！【註七六】

曾國藩雖係就軍事立論，亦可見體用的要義。

曾國藩對一般事務的看法，有禮有用；對洋務的看法，也是有禮有用，他雖不用「中體西用」一詞，他在處理洋務時，確是有體用觀念的。他在一八六六年六月的日記中說：

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爲急務，以學作炸礮、學造輪舟等具，爲下手工夫。【註七七】

文中「修政事、求賢才」爲體，「學作炸礮、學造輪舟」爲用，所謂「修政事」，他在一八五一年八月的日記中有所說明，他說：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註七八】

「賢才」尤爲體中之體，他的意見如前所引：「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這使人想起倭仁反對向西人學習技藝的一句話：「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註七九】但下面即將論述，曾國藩認爲技藝亦很重要。

與學作炸礮、學作輪舟相比，中國的政事、人才爲體。以中外相涉而論，權操自我、維持和平爲體，購製船礮、訴於戰爭爲用。吳汝綸在曾國藩神道碑文中說：

初咸豐三年，金陵始陷，美利堅人嘗謁江南帥，願以夷兵助戰。十一年和議既成，俄羅斯、美利堅皆請以兵來助。公議以爲宜嘉其效順，而緩其師期。及同治元年，英吉利、法蘭西又以爲請，公又議以爲宜申大義以謝之，陳利害以勸

之，皆報可。廷議購夷船，公力贊之。比船至，欲用夷將，則議寢其事。其後自募工，寫夷船之制，近似之，遂開局製造。自是外洋機器輪船夷礮，中國頗得其要領矣！六年，詔中外大臣，籌和議利害，可許不可許？公議以爲其爭彼我之虛儀者許之，其奪吾民之生計者勿許也。移直隸總督，天津民有擊法蘭西領事官者，法人訟之朝，天子慰解之。

法人固爭，有詔備兵以待。公曰：「百姓小忿，不足肇邊釁。」從之。而密議儲將備兵，設方略甚備。【註八〇】

可以看出曾國藩處理涉外事件的基本原則是：①避免主權移於外人，②避免利權歸於外人，③避免戰爭以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至於對付外人的政策，約有四種：①安內之際，不要攘外；②守住條約，以和爲尙；③大事苦爭，小事放鬆；④勤於練兵，不先開衅（外修和好，內需自強）。【註八一】

「西用」可以分五方面論述：其一，「借夷助剿」：英法聯軍結束後，俄、美、英、法等國願助清軍剿太平天國，在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二年間，清廷三次徵求曾國藩的意見，如前所述，曾國藩初不贊同，最後同意「借夷助剿」，但應限於上海一地，因上海爲通商口岸，外人與清政府有共同的利害。【註八二】這是清政府用美國人華爾（Ward）練洋槍隊的由來。

其二，購買洋槍洋礮：雖然直到一八六四年一月曾國藩仍認爲「我國仍當以抬鎗、鳥鎗、刀、矛及劈山礮爲根本武器」，早自一八五四年起，曾國藩即爲湘軍購買洋鎗、洋礮。曾國藩透過兩廣總督葉名琛的協助，購買洋礮六百尊，湘軍在湘潭、岳州兩次大捷，即賴洋礮之力。到一八六〇年代初，他大倡購買船礮。【註八三】他於一八六一年八月在覆陳購買外洋船礮摺中說：「購買外洋船礮，爲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不過，在同摺中，他也主張「購成之後，訪募軍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製造。」【註八四】

其三，製造船礮：早在一八五三年，曾國藩即於衡陽、湘潭兩地設廠，仿照廣東快蟹、長龍各船，依式製造。又在長沙設礮局。但均生產舊式船礮。到一八六〇年十二月，曾國藩決定造西洋船礮，他於一八五八年在江西所建立的內軍械所，到一八六一年移到安慶，僱用中國工匠，除製造大礮、礮彈外，並仿造小火輪船。一八六二年小火輪船完成，但「行駛遲鈍」。一八六三年他派容闓赴美採購機器，準備擴充內軍械所。一八六四年克南京，將內軍械所遷南京，改爲機器製造局。一八六五年容闓自美國購買的機器運到，曾國藩將機器製造局遷往上海，與李鴻章設在上海的礮局和自上海美商手中購得的旗記

鐵工廠合併，改爲江南製造總局。到一八六八年完成第一艘輪船。【註八五】曾國藩對各種製造，甚有興趣，常親自前往察看。一八五九年九月日記有云：「余至武昌火藥局，看造火藥之法。」一八六二年八月日記有云：「華衡芳、徐壽所作火輪船之機，來此試演。……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爲之。」一八六八年六月日記有云：「至機器局，觀一切製造。」一八七一年十一月日記有云：「至礮廠，……閱新作之礮。」【註八六】

其四，建水師、修礮臺：曾國藩建湘軍時，爲「剿髮逆」，即建水師，惟兵船及編制皆爲舊式。與太平軍作戰後期，戰場「在陸而不在水」，並未積極購買洋船，但卻支持江南製造局及馬尾造船廠製造洋船，目的在「勤遠略」，即防備外來侵略。不過，曾國藩認爲，在新式水師建立前，若同西方國家進行海戰，中國決非其敵，備敵之法，以扼守礮臺爲最重要。因此，曾國藩以「礮臺爲第一要義」，各海口之礮臺，須仿照外國礮臺之式，重行修造。【註八七】

其五，翻譯科技書籍：曾國藩既提倡製船造礮，又深知「洋人製器出於算學」，而「彼此文義扞格不通」，遂認「翻譯之事，係製造之根本」。一八六七年，接納徐壽的意見，於江南製造局附設翻譯館及印書處，匯集中國科學家，輔以外國專家，從事科技書籍之翻譯。至光緒末年，譯書達一百七十餘種。【註八八】

其六，派留學生學習西洋科技：研究西方科技，除翻譯西書外，爲派遣幼童赴美留學。一八七〇年容闈向曾國藩建議派遣幼童留學美國，先選定一百二十人，分四批派遣，曾國藩乃於次年會同丁日昌等奏請辦理。摺中云：「國藩上年在天津辦理洋務，經前江蘇巡撫丁日昌奉旨來津會辦，屢與臣權擬選聰穎幼童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科，約計十餘年學成而歸，使西洋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然後可以漸圖自強。」一八七二年八月十一日第一批幼童由上海啓程赴美，時曾國藩已逝世。【註八九】

曾國藩是洋務運動最早的倡導者和實踐者，許多經辦局廠、製礮造船的洋務人員，曾國藩都精心挑選、破格重用，或言傳身教、或保薦於朝，在短時間內，就出現一大批辦理洋務的人物。從左宗棠、李鴻章到丁日昌、沈葆楨、郭嵩燾等人，再到容闈、沈葆靖、李善蘭、華衡芳等人，無不出自曾國藩的門下。【註九〇】

六、結 論

一九二七年長沙雅禮書院歷史教授赫爾(William James Hail)在「曾國藩與太平之亂」(Tsung Kuo-fa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一書中給予曾國藩的評價是：①戰士，②政治家，③滿清的忠僕，④儒家的偉人，⑤遠東的華盛頓。【註九一】此後六十餘年間，學者對曾國藩的評價不一，除民族主義派的史學家指其平定太平天國有違民族大義、左派史學家指其為漢奸、鎮壓農民的劊子手以外，一般的評價正面較多，負面甚少。

本文的研究分為四方面：從敦品方面來說，曾國藩是一個標準的儒者，本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路，安排自己的一生。修身、齊家及義理之學為其「獨善其身」的自我要求，定亂、洋務及經世之學為其「兼善天下」之本，其個人風範及家訓影響後世甚大。從治學方面來說：修身得力於義理，事功得力於經世；他對義理、經世之學不偏廢，而且互相發明。從定亂方面來說，無論係基於忠君，還是基於保教、愛民，都有其正當性，重要的影響有三：①使中國免於分裂或毀滅，保住大清王朝；②振奮湖南的民心士氣，【註九二】使湖南在近代歷史上常有突出表現；③湘軍兵員自募，權歸主將，軍餉自籌，官職私相授受，注重私誼，各樹一幟，各尊其長，人自為政，【註九三】開後世兵為將有之風。從洋務方面而論：曾國藩與西人接觸無多，但其幕府中有容闈、李善蘭等西學之士，均能在購造船礮、翻譯西書、派遣留學、講求外交等方面，開洋務運動之宏規。當時講求西學者多被指為名教罪人，曾國藩以經世故，大講洋務，對中國科技的現代化甚有貢獻。

曾國藩以儒者治軍從政辦外交，在這方面為近代中國歷史留下三種重要的遺產：其一，由游弋於義理與經世之間而產生的體用觀念，使政治上產生可變、不可變二元論，主政者希望將可變者減至最少，而形成保守主義，故激起一連串的革命。其二，由於內部的動亂或革命比外患更妨害政權的存續，產生了安內時不攘外、安內後亦不攘外的外交政策。政府的對外民族主義過於理性，益發使民間的民族主義走向激情。反帝口號比實質改革更富有動員的力量，使中國的立國態勢流於虛矯。其三，近代以來中國內亂外患嚴重，國家仰賴軍隊較任何其他為重要，曾國藩樹立了保政權、得政權從建軍始的範例，使清末民初的政權大都以軍權為基礎，龐大的軍費頗影響國家建設，而以軍立國忽視了非軍事因素，更影響國家的民主化。

附 註：

- 【註一】：引見何貽焜，「曾國藩評傳」（臺北，一九五三），頁五四六、五四九、五九〇、五九九—六〇〇、六〇三、六一〇—六一一。
- 【註二】：蔣星德，「曾國藩之生平及事業」（上海，一九三五），頁二二。
- 【註三】：太谷孝太郎，「儒將曾國藩」（東京，一九七七），頁四四—四五。
- 【註四】：饒懷民、王曉天，「曾國藩研究述評」，「湖南師大社會科學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五期，頁三一六。
- 【註五】：前引蔣星德書，頁二七—三〇，曾國藩年表。
- 【註六】：曾國藩，「曾文正公家書」（臺南，一九六〇），頁七—七三。
- 【註七】：前引「曾文正公家書」，頁三—四一；曾國藩，「曾文正公日記」（臺北，一九七九），頁二八—四八。二書皆為選本，所選內容，對修身、齊家特具意義。
- 【註八】：李榮泰，「湖鄉曾氏研究」（臺北，一九八九），頁五—二〇〇。
- 【註九】：成曉軍，「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長沙，一九九一），頁一九四—一九五。
- 【註一〇】：「曾文正公全集」（臺北，一九六三），頁二四—二五；「曾文正公家書」，頁一八—一九。
- 【註一一】：「曾文正公家書」，頁二一。
- 【註一二】：「曾文正公全集」，頁一九〇—一九二。
- 【註一三】：同上，頁四六。
- 【註一四】：同上，頁一八四。
- 【註一五】：同上，頁九—一九二。
- 【註一六】：同上，頁八。
- 【註一七】：汪林茂，「曾國藩與沈葆楨的恩怨」，「歷史月刊」第六七期，頁九六—一〇一。
- 【註一八】：朱東安，「曾國藩」（成都，一九八五），頁二二—二七。
- 【註一九】：曾國藩，「曾文正公日記」，頁一一。
- 【註二〇】：何烈，「曾國藩」（臺北，一九七八），頁一五—一七。

- 【註一二】：黃澄河、柯金泰，「曾國藩與中國封建主義思想正統地位的終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八五年第五期。
- 【註一三】：曾國藩，「曾文正公家書」，頁四三。
- 【註一四】：同上，頁三二。
- 【註一五】：同上，頁六三。
- 【註一六】：饒懷民、王曉天，「曾國藩研究述評」，「湖南師大社會科學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 【註一七】：黃澄河、柯金泰，「曾國藩與中國封建主義思想正統地位的終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五年第五期。
- 【註一八】：何貽焜，「曾國藩評傳」，頁三〇—三三。
- 【註一九】：同上，頁三〇，三二三。
- 【註二〇】：蔣星德，「曾國藩的生平及事業」，頁三四—三五。
- 【註二一】：前引何貽焜書，頁三一八。
- 【註二二】：前引蔣星德書，頁一四四。
- 【註二三】：同上，頁一三九。
- 【註二四】：前引何貽焜書，頁三七—三七二，三八〇，三八七，四一一。
- 【註二五】：朱東安，「曾國藩傳」，頁三〇—三〇三。
- 【註二六】：蕭一山「清代通史」(三)(臺灣商務印書館本)，頁一。
- 【註二七】：同上，頁七七五—七七七。
- 【註二八】：原書，頁三〇。
- 【註二九】：引見饒懷民，「淺析曾國藩的忠君思想」，「湖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八四年第二期。
- 【註三〇】：引見何貽焜，「曾國藩評傳」，頁一九二。
- 【註三一】：前引饒懷民文：何烈，「曾國藩」，頁一〇，一九—二〇。
- 【註三二】：曾國藩，「曾文正公家書」，頁二二八。
- 【註三三】：同上，頁一一。

- 【註四四】：同上，頁一六三。
- 【註四五】：同上，頁一三。
- 【註四六】：同上，頁一八八。
- 【註四七】：同上，頁一八九。
- 【註四八】：同上，頁一一。
- 【註四九】：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頁三。
- 【註五〇】：同上，頁四。
- 【註五一】：同上，頁四八四。
- 【註五二】：一八五四年、一八五五年家書，見曾國藩，「曾文正公家書」，頁一五一，一六三。
- 【註五三】：引見王爾敏，「曾國藩與李元度」，「故宮文獻」三卷三期，頁二。
- 【註五四】：Andrew Cheng-Kuang Hsieh, "Tseng Kuo-fan, & Nineteenth-century Confucian General",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75. Pp. 100-111.

- 【註五五】：「曾文正公全集」，頁三五—三五二，三五四—三五八。
- 【註五六】：引見何貽焜，「曾國藩評傳」，頁三二。
- 【註五七】：引見蕭一山，「清代通史」(二)，頁七五。
- 【註五八】：「曾文正公家書」，頁一八七。
- 【註五九】：櫻井信義，「曾國藩」(東京，一九四三)，頁三〇六—三〇七。
- 【註六〇】：同上，頁三二。
- 【註六一】：同上，頁二二—二二二。
- 【註六二】：近藤秀樹，「曾國藩」(東京，一九六六)，頁一六〇—一六一。
- 【註六三】：引見彭靖，「曾國藩評價中的幾個問題」，「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六年第三期，頁四。
- 【註六四】：成曉軍，「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頁六〇。
- 【註六五】：前引彭靖文，頁六。

- 【註六六】：曾國藩，「曾文正公家書」，頁一四一。
- 【註六七】：前引彭靖文，頁五。
- 【註六八】：「曾文正公全集」，頁四八六。
- 【註六九】：同上，頁四八八—四八九。
- 【註七〇】：「曾文正公日記」，頁五七。
- 【註七一】：成曉軍，「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頁一〇三—一〇四。
- 【註七二】：景珩，「湘軍——太平天國革命時期的反動地主武裝」，「歷史教學」，一九五七年九月號，頁四四。
- 【註七三】：卞哲，「曾國藩傳」（上海，一九八四），頁九三。
- 【註七四】：「曾文正公家書」，頁八五。
- 【註七五】：顧、王、陳三人事跡，見「清史稿」儒林傳二及列傳九十四。
- 【註七六】：「曾文正公全集」，頁三五七。
- 【註七七】：「曾文正公日記」，頁二五。
- 【註七八】：同上，頁二三。
- 【註八九】：陸寶千，「清代思想史」（臺北，一九七八），頁三四。
- 【註八〇】：引見何貽焜，「曾國藩評傳」，頁五六—五六二。
- 【註八一】：陳貴宗等，「洋務運動的首創者——曾國藩」，「吉林大學社會科學論叢：洋務運動專輯」，頁一七五—一七七。
- 【註八二】：朱東安，「曾國藩傳」，頁一七四—一七五，三一六。
- 【註八三】：何烈，「曾國藩」，頁八〇—八二；殷紹基，「曾國藩與洋務運動」，「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六年第三期，頁五八；前引陳貴宗等文，頁一六六—一六七；成曉軍，「曾國藩與近代中國文化」，頁三三。
- 【註八四】：引見蕭一山，「曾國藩傳」（臺北，一九五五），頁一八一。
- 【註八五】：朱東安，「曾國藩傳」，頁三三—三三四。李鴻章於一八六五年將蘇州洋礮局遷南京，另建機器局，見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台北，一九六三），頁一〇六。
- 【註八六】：「曾文正公日記」，頁二五，二八。

【註八七】：前引陳貴宗等文，頁一六九—一七二。

【註八八】：成曉軍，「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頁三三九—三四一。

【註八九】：同上，頁一九二—一九三；前引殷紹基文，頁六〇。

【註九〇】：前引陳貴宗等文，頁一七四。

【註九一】：William James Hail, *Tseng Kuo-fa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 (London, 1927), pp. xi, 371.

【註九二】：咸豐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曾國藩致季弟函：「吾湖南近日風氣蒸蒸日上，凡在行間，人人講求將略、講求品行，並講求學術。」見「曾文正公家書」，頁一三七。

【註九三】：朱東安，「曾國藩傳」，頁三二六—三四七。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故宮學術季刊 第十一卷 第二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